

1921年、7月、上海…… 13个开天辟地的人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这所放了暑假、平时只有女性进出的学校,突然来了9个陌生的客人,而且一律都是二十多岁的男性。

从他们南腔北调的口音可以听出,都是些外乡人。这些或穿长衫、或学生装束的外乡人在女校一住就是七八天。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偌大的上海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然最终还是有人盯上了他们,但当巡捕房对他们的作为有所警觉并准备采取行动时,他们在一夜之间离开了上海。第二天,他们去了浙江嘉兴的南湖,在一条游船上完成了他们最后的工作。

1921、上海、嘉兴南湖,如今,当我们看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时,这些人的名字很自然地就会浮现出来: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这9个人连同当时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陈公博,13个为了理想前行的人,在90年前的那个夏天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13位来自国内6个城市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在短短几天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

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他们。

□快报记者 倪宁宁 陈曦

从7月1日到7月23日

虽然建党在1921年夏天的达成,既是水到渠成,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提及这件事仍然不能不提两个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他们的出现对促成建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之前来中国指导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一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1921年3月,马林受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委派从莫斯科出发,取道欧洲前往上海,来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3个月之后的6月3日,马林抵达了上海。而从西伯利亚出发的尼克尔斯基也差不多同时到达那里。”这句话出自马林的一份手稿,在上海,他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抵达上海不久,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就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与李汉俊会面。会面中,马林了解到中国当时已经有6个城市和旅日、旅法两个留学生社团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便判断说,在中国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尼克尔斯基提出了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他们两位,一南一北,是国内公认的党的领袖)商议,最后确定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李达与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旅日,及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通知他们各

派两位代表前来参加党的一大。考虑到法国路途遥远,他们没有给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发邀请信。为了减轻代表的经济负担,马林还为每位代表提供了100元的路费。

据李达1954年的回忆文章称,在通知中,大会召开的日期原本是7月1日。而实际上,一直到7月23日,大会才在上海召开。

13位代表,50多位党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的通知时,几个北大的成员正在北京西城为青年学生补课。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学,刘仁静教英文。北京小组里,李大钊是公认的领导人,也是大家的良师益友,但李大钊并没有当这个代表。当时,李大钊正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还是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事务非常繁忙。而且这一年的暑假,他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所以无法分身南来。于是,北京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参会代表。

刘仁静后来在《一大琐忆》中回忆了当时北京代表的产生经过,“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上海的会议。包惠僧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就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就代表广州党组织分头赶赴上海。

据刘仁静回忆,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推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但是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

后才确定由刘仁静当代表。

选择张国焘做代表是很自然的事。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张国焘是除李大钊之外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他也是小组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张国焘长于审时度势,善于上下联系,八方张罗,他遇事安排布置主动周密,也能积极热情带头去干,因而被视为“高等事物人才”。他活动能力强,又好出头露面,宜于搞行政工作却有较强领袖欲,连当选学联的总务主任还不满意,不肯就任。但他乐于作为“学生要人”(邓中夏语)与名流结交,与李大钊关系尤其密切,常以李大钊代表身份出面处理问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前台指挥。

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出生于1902年,当年不足20岁,他热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国焘称他是“那位书呆子”,张国焘因受命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在代表产生后,即刻动身去了上海;刘仁静则在7月7日左右才抵达上海。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他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陈公博为广州的代表。此外,陈独秀又委派武汉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会议。包惠僧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就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就代表广州党组织分头赶赴上海。

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

行。夫妇俩在7月14日由广州出发先到香港,经由香港转赴上海,抵达时,已经是7月21日了。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从上海回到广州,陈公博怕人知晓自己的行迹,赶紧又公开发表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暑假期间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从中可以看出,陈公博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是极小心的。包惠僧则在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接到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也如期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当时,在东京的施存统和在鹿儿岛的周佛海都是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但由于产生后,即刻动身去了上海;周佛海却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

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因为他们既是党小组的核心,又是新民学会的代表人物。而李达、李汉俊这两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既是一大的代表,又是一大的筹备与组织者。此外,武汉的党组织派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党组织派出了王尽美和邓恩铭。

据史料记载,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代表了全国50多位党员。在1921年的夏天,这13个为了理想前行的人,正在从四面八方走向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毛泽东:湘江北上

和写信的人少了一样,今天写日记的人也少了,年轻人更热衷于微博。但日记是个好东西,特别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尤其珍贵。在党内被誉为谢尔的谢觉哉在1920年写的日记,就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长沙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信息。

这篇写于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这说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是1921年6月29日动身去上海的。1952年,谢觉哉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

那个时候长沙与上海之间没通火车,他们只能从水路走,先坐船到武汉,然后自武汉转赴上海。如果航行顺利,5天后,也就是7月4日可以抵达上海。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5天的行程中,两位湖南的共产党人都做了哪些交流。但有足够的史料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梳理这两位湘人通往上海所走过的路。

和几乎所有的湖南人一样,毛泽东身上有浓厚的湘江情结,在长沙一师读书期间,他曾多次畅游湘江。诸如“橘子洲头,湘江北去”等诗词,也印证了湘江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轮船沿着湘江北上武汉时,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想起了他的第一次出差之行。

差不多3年前,也就是1918年的8月15日,25岁的毛泽东会同李

维汉、罗学赞、张昆弟、萧子升等24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武汉后转火车直赴北京。

“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了这个运动。”多年以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了这件事。

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受蔡元培的邀请在北大教授伦理学,他也很希望毛泽东能走出湖南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来。

在北大,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了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把毛泽东留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了图书管理员。

因为工作的缘故,毛泽东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新出版的报纸杂志,从中汲取新知识。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都曾在这里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邵飘萍等人。因为当时李大钊已经接受并正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自然地受了他的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为赴法留学的湖南青年送行,4月他回到长沙。不久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撰写

了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文章传到北京和上海,给李大钊和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年底,毛泽东第二次赴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这一次他在北京待了近4个月,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4月11日,他又来到了上海,3个月内,他多次拜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与之探讨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起这段经历时,甚至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到了1920年的夏天,自己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还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同年10月、11月间,受陈独秀的委托,毛泽东和何叔衡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因为曾经和陈独秀有过近距离接触,毛泽东了解他的建党思路,所以当他在6月底接到参会通知时,并不觉得意外。

张国焘:第一个“客人”

就在各地党组织纷纷响应上海的召唤,推选代表、准备起程赴上海之际,上海党组织作为发起者和东道主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李达、李汉俊又不容辞地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李达的

妻子王会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新女性,她先后落实了会址和代表们的食宿。

李达迎来的第一个客人是张国焘。张国焘因为是筹备会议的成员之一,所以很早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途经山东时,他还停留了一天,约见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催促他俩早日来上海。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在广州公务繁忙,不能前来出席会议,因会议的主持者需要同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不善交往,与马林的关系也不融洽,所以在临开会前,代表们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为何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呢?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中叱咤一时的学生首领,其组织才能和演讲水平让在座代表早有耳闻。众所公认的事实是,虽然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他们依然是党的创始者与领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不争的事实。而为了落实建党事宜,张国焘接受李大钊委派,奔走于南陈北李之间,做了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张国焘是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没有停止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1919年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辩护;二是借通各校复课,并查封组织“联合会”“义勇队”等爱国组织。

6月2日,张国焘带头发布讲演,声明不服从禁令。张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他生

平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张国焘等人的被捕,使学生们愤怒异常。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从6月3日起,大举出动,恢复街头讲演。

在北京政府被迫允许学生的要求后,6月8日,被捕学生各自返回本校。张国焘等7人在6月6日被宣布释放后,坚持不出去,直到6月8日警察厅一处长出面向他们道歉后,才答应离开。后来,由于李大钊的引导和帮助,张国焘开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约在7月12日,李大钊要张国焘离开北京,以免他被北洋政府加害。张国焘说要去上海,李大钊让他赶紧起程,并要他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谈进一步的计划。

7月13日下午,张国焘乘火车赴天津。第二天,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同一天,张国焘离天津南下,不久到达上海,在法租界环北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见到了住在这里的陈独秀。

陈独秀于2月间来上海后,继续主编《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研究劳工问题。张国焘到达上海时,正值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开幕在即。陈独秀也因忙于会议而无暇顾及他。直到7月下旬后,才同陈独秀进行了长谈。张国焘向陈独秀传达了李大钊的意见后,陈独秀开门见山地提出要组织一个共产党。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人又进行了多次谈话,讨论了如何建党的一些具体问题。

不久的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10月成立。

(下转A8、A9)



正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的人们



纪念馆内,蜡像真实再现了当年的会议情形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制图 李荣荣